■ 政德镜鉴㊿

官位的高低，并非丈量政绩的标杆。即使官低职微，只要将“民心”悬在心头，亦能做出一番利国利民的事迹来，让官德政声传颂后世。

岳镇九：官位不必高，民心不可少

□ 本报记者 鲍青
本报通讯员 薛海波 杜杰

在济宁市嘉祥县孟姑集镇，有一句广为流传的俚词俗谚，叫“无岳不成村”，用来形容当地岳氏家族的人丁兴旺。而这一带“岳姓”的中心，便在岳楼村。

岳楼村位于嘉祥西北15公里处。若乘车从嘉祥出发，很快便进入乡间田野。道路有时从低矮的土岗翻过，有时有精巧的小桥跨越算不得宽广的河流。两旁视野开阔，偶尔会有高大的道旁树遮住视线。举目四望，远处的村落、耕田、池塘、山岗、树林，依次映入眼帘，好一幅美妙的田园风光图。

300多年前的康熙年间，岳楼村的岳镇九（名峰秀，字镇九，以字行）便从这里出发，开始了自己的仕途之旅。他北上赴京赶考，西进河南任职，入京担任谏臣，还乡兴办义学，足迹所至，皆有惠政可闻。时至今日，他的事迹依旧在当地流传和回响。

“岳镇九最后的官位并不高，但他清廉为民的精神却世代流传，对廉洁为官至今也有借鉴意义。”岳氏后人岳彩俭说。

岳楼村内的岳氏宗祠 （鲍青 摄）

乱世遗民，勤于耕耘

百姓对土地的眷念，无论和平还是战乱，始终显而易见。不管自己身在何处，只要有地可耕，便一遍遍重复着世代相袭的动作和节奏。初春转暖，把珍贵的种子播撒进泥土，期待稚嫩幼苗破土而出。初夏时节，阳光雨露，灌溉荷锄，只望庄稼茂盛，田野葱茏。秋风送爽时，喜悦地刨出一窝窝硕大洋芋，收割一粒粒饱满粮食，盛装沉甸甸的自豪和满足。

如今枝繁叶茂的岳氏家族，便是于乱世之后，来到这片荒芜的土地，靠着勤劳的双手，翻捡出属于自己独特的家族记忆。

“我们是岳飞之后，后来避难辗转到了山西。元末天下大乱，明初勘定宇内，齐鲁十室九空，已是满目疮痍。许多移民便奉旨从山西洪洞，千里迢迢迁徙而出。洪武四年（公元1371年），我们的祖先岳孟明、岳仲明、岳季明兄弟三人，便跟随移民大军来到齐鲁，落户到汶上县南旺湖内。”岳彩俭说。

兄弟三人均系匠籍出身，以红炉打铁为生。今日的岳楼村，依旧熔炉铸铁，技艺相传。永乐九年（公元1411年），水利学家白英治理运河，他“南旺分水”借水济运，使汶水“三分下江南，七分朝天子”，又在南旺南北建节水制闸38道。因此缘故，岳氏三支相继于村庄原址迁出。长兄岳孟明，率本支迁到黄河北的阳谷寿张一带；三弟岳季明一支，则迁梁山县坡北拳铺；二弟岳仲明，向西南挪动十余公里，仍留在南旺湖附近，后来建起岳楼村。

“因为姓岳，又以熔炉铸铁为生，所以村庄开始叫岳炉。后来人丁兴旺，财力丰裕，就建了高楼，改称岳楼。”岳氏后人岳耀臣摩挲着厚厚的家谱，向记者娓娓说道。

时光犹如缓缓流淌的运河，带走世间无数的喜怒哀乐。岳楼村的代代生民，沐浴奔流不息的流水，旧貌频频换新颜。

天启七年（公元1627年），一个婴孩降生于岳楼村。父亲为他起名峰秀，字镇九，寄托自己美好的祝愿。后来婴孩用自己的行止，为这个平凡普通的家族，增添了值得回味的记忆。

七岁时，岳镇九来到邻近的韩堂村，拜塾师韩康所为师，跟随他开蒙读书。韩康所褒奖他聪颖刻苦，能蔽古力学。

求学的岁月，艰辛之外，甜蜜与苦涩并存。先是天下动乱，盗贼横行，年纪轻轻的岳镇九被迫蛰伏民间，一心读书，不问天下事。做秀才时，岳镇九便常以天下为己任，乱世之际更是期待行道治民。顺治八年（公元1651年），24岁的他得中山东乡试举人。登第之后，不改简朴之气，依旧穿朴素寒衣。当年同榜中举者，还有后来的山左文坛领袖王士祯。但此后岳镇九的科举之路却坎坷不顺，屡次落第，直到十年后才中进士，时年已34岁。

经吏部文选司掣选，岳镇九到河南封丘当县令。

由书籍上的圣贤之道，投身到现实的治地安民，绝不是简单的场景转换。有时于治国安邦能侃侃而谈的儒生，到了实践中却成了摸象盲人，束手无策，一筹莫展。要成为一名循吏廉官，不仅要有洁身自好的品性气节，更需熟稔民心的实践头脑。

当时的封丘，是明末战乱的重灾区。到那里做县令，是个十足的苦差事。岳镇九踌躇满志地上任了。

茅根开荒，柳梢官运

明末清初的河南，经过灾荒与战乱的荼毒，动荡不安，孑遗难觅。史载“多地大饥，饿殍枕藉，白骨遍野”，“村镇之饿死一空，城市皆杀人而食”。

乱后重建、恢复秩序、发展生产，是岳镇九上任后的第一要务。他决定以“古循吏之法”来治理封丘。

可到了封丘，呈现在岳镇九眼前的，却是田园荒芜、茅草丛生，一片荒凉景象。百姓们面黄肌瘦，衣衫褴褛，逃荒者不绝于道。岳镇九花了整整一个月时间，访问百姓，察看灾情，跑遍了全县村寨。他发现这里土地原本就贫瘠，又加明末战乱，百姓四散逃难，大量良田撂荒，以致茅草遍野。如今饥民贫寒乏力，让其锄草垦荒，无疑是强人所难。

百姓致贫的原因厘清后，接下来就是如何“扶贫济困”了。岳镇九先将封丘情况拟就奏折，上报朝廷，恳请减免钱粮赋税，让百姓有喘息之机。可清廷此时四处征战，百废待兴，财力奇绌，未批准他的请求。无奈之下，他只得自己筹划以解民忧。他决定用微薄的俸银和故乡的田产作为激励基金，动员百姓动手恢复发展生产。

岳镇九回到老家，获得宗族支持，变卖部分田产，得到一笔充足的资金。接着他回到封丘，着手开始实施自己的计划。

岳镇九张贴了一份奇怪的告示。他通告县境百姓，凡是开荒刨得的茅根，县衙皆按价购买。而且谁开垦出的荒地，就归谁耕种，更免交一年税。布告一经张贴，百姓议论纷纷，叹为奇事。他们带上农具，争相下地去刨茅草。即使流落他乡的百姓，也都闻讯赶回，加入了锄草大军。几个月后，各家各户都刨出一大堆茅草根，也开垦出大片荒地。岳镇九让衙役在县衙旁开辟空地，专门用来贮存百姓上交的茅根。

茅草清除完毕，岳镇九再次返家，购置庄稼良种。他雇用铁轮车将种子运到封丘，无偿分发给百姓。他还把收来的茅草，堆放到新开垦的土地上，任其腐烂以培育土壤肥力。经过这番努力，原本的荒野变为良田。一年之后，封丘大丰收，遍地高粱红、谷子黄、棉花白、菜花飘香，欣欣向荣。挣扎在饥饿线上的百姓，衣食无忧，满脸喜色。

接着岳镇九又未雨绸缪，组织百姓兴修水利，拉淤压碱，推广稷黍等耐碱作物，提倡合理密植，迅速改变全县面貌，把贫穷的封丘治理得地肥年丰。

当时封丘百姓之急，一为饥寒交迫，一为柳梢转运。当时治理黄河、堵塞决口，需用埽工维持。埽工是以柳梢、苇、秸和土石，分层捆束制成的河工建筑物，用于护岸、堵口和筑坝。因封丘产柳，便承担了多地的用柳需求。

可除了堤柳和圈柳外，封丘其余之柳，皆是民间纳粮土地来栽种，供官府采办。柳树生长期长，数量有限，而官府需求无穷无尽。据史载，当时如桃源、宿迁等处，使用河南之柳二百七十余万。本省黄河治理，用柳也不下百余万。

繁重的柳梢供应，让百姓不堪其累，更影响社会安宁。

因柳梢大量外运，当地极度乏柳。本地水患，只能砍伐桃李杏诸树来堵复决口。百姓向岳县令诉苦，言柳树并非数月一栽即可粗壮可用，官府年年催征，百姓只能四处采办，奔波劳碌应接不暇。而且柳梢即使齐备，还需百姓雇船转运，负担更加沉重。黄河泛滥无常，水势汹涌，洪波直泻，商旅畏惧，船只往来稀少，为运送柳梢要冒生命危险，船覆民死事故屡有发生。

岳镇九经调查，发现每只运船可装柳不过二三百束，而官府给价却不抵成本，以致船只不愿承担转运，柳梢民运已难以为继，“大河又无片帆往来，百姓运柳至河干者，止有望洋而叹，官吏束手无策”。岳镇九认为，若不立即变通此策，百姓势必饱受赔累，将来必至误运，影响河道安全。他向朝廷建议，一方面减少柳梢外运量，从他处调拨备用；一方面由民运转为官运，统一贩运，降低成本。此计施行后，当地转运局面旋即好转，而百姓脱困，欢呼不已。

待封丘社会经济好转，百姓安居乐业，岳镇九便又着手文化建设，修复当地人文古迹。

唐时著名诗人高适，曾在封丘任过县尉。岳镇九修建高常侍祠，并定期举办祭祀典礼。春秋时，吴王夫差曾率军至封丘黄池，召开诸侯大会，与晋国争做霸主。封丘境内又有战国时宋康王所修青陵台遗迹，岳镇九皆于原址立碑，以示纪念。王士祯闻其事后，亲游其地，作《古迹三首为岳给事赋》，赞扬他能兴复古之遗迹，造福今之百姓。岳镇九所立的古黄池碑，今还有残碣存世。

封丘任上数年，岳镇九政绩昭然。时人评价他在封丘的政绩：“真有琴鹤风度，考其治绩，惟有噪农桑，讲孝弟，视黄童白叟如父子家人。而清操饮冰……甘棠之爱，至今蔼蔼口碑间。”吏部考核地方官员，他获评循吏。事迹奏报清廷，康熙特举卓异第一，并将他调到京师任职。

循吏终要离别，百姓眷念不舍。岳镇九离封丘当日，无数乡绅百姓前来送行。他们携妻带子，捧来家中珍宝，跪地恳求他收下心意。岳镇九执意不从，百姓便决不放行。僵持不下之际，他随手指着道旁的一块破石槽，示意若要表达心意，可将它送给自己。

岳镇九以为，自己选中如此荒诞不经之物，又粗重破旧，百姓必然知难而退。未成想，封丘百姓在他走后，竟将破石槽连同县衙里的太湖石一并送到了岳镇九的故乡。这两样物件，至今保存完好，陈列于岳楼村岳氏宗祠中。

更为惊奇的是，在岳镇九离任后，封丘百姓始终感念挂怀，竟几度恳请朝廷再让他到封丘任职。朝廷为安抚民意，将其父崇功调任到封丘，父子县令成为一时美谈。

肥缺显瘦，清贫甘守

岳镇九调任京师后，先任正五品的礼科给事中。据《清史稿》载，六科给事中官位不高，权力却很大，他们“掌言职、传达纶音、勘鞫官府公事，以注销文卷，有封驳即闻”。

清朝吸取前朝为政得失，尤为重视言官作用，把它当作监督百官、了解疾苦的重要渠道。顺治之时，皇帝就数次就求言而下诏，“关于朕的事情，有什么诏令没遵从，什么政策没兑现？诸王、贝勒、办事诸臣，有无旷职的过失？何害未除？何利未兴？言官皆可各据见闻，谏言无所遮掩。一切能启迪朕，匡弼国政的，只要属实，即可采用。即使有不当的言论，也必不加罪”。后来他又对言官群体开诚布公地说：“凡事关政治得失民生休戚，应兴应革的典章制度，有切实可行的，言官们都要悉心条奏，直言无隐。”

到了康熙时，岳镇九也曾对大臣道：“国家设立言官，专司耳目，凡政治得失，民生利弊，必须详切条陈，直言无隐，斯为称职。若但敷衍虚文，浮冗剿袭，或以不急之务，草率塞责，非朕广开言路之意。”

在皇帝的鼓励下，言官群体竞相谏言，力陈得失。其中岳镇九更多次力陈治国安民良策、地方百姓急切之事。他封章屡上，言辞恳恳。皇帝视其奏疏为机密，往往阅后即焚毁，卓然以古谏官相期。岳镇九上奏陈事，非为沽名钓誉，若认为此事不仅有伤国体，且无济民生，绝不肯多言。他鄙视迎合揣摩之风，羞耻干谒奔竞之习，誓为朝廷存大体，为言路扶正气。

礼科给事中除谏言讽喻外，还担任文武两闱的考官。康熙二十一年（公元1682年），皇帝钦点岳镇九为会试同考官、殿试收卷官，复充武会试同考官。担任考官期间，他悉秉虚公，所拔多宿学英伟之士。他对选拔的人才，都砥名砺行，以古之廉吏作为勉励的楷模，对他们悉心培植呵护。若遇清贫有才的子弟，还时常留之邸舍，嘘寒问暖，关心备至。而他自己，饮食却居处淡泊，将微薪薄禄用于赈济旁人。学子受其恩惠，争自濯磨，各期不负所学，以图建功立业。

因为谏言得体、选才有方，康熙提拔他任刑科给事中的最高长官掌印给事中。刑科掌印给事中，其职责除谏言外，还“分稽刑名”，“稽核刑名案件，复奏死刑重案”。对于经“朝审”“秋审”后议定为“情实”的人犯，刑科可以“三复奏闻”，即在勾决下达执行死刑命令之日，三次复奏请皇帝再予考虑。

因为掌管刑名、判决生死，岳镇九一定程度上掌握了部分囚犯的生杀大权。那些罪人家属，为了减轻或逃避刑罚，纷纷登门求情，而意欲贿赂者更是络绎不绝。岳镇九于请托枉法之事，一律依凭法条严格执行，从不顾及颜面以徇私情。因为办事公正廉明，他赢得了正直朝臣的喝彩，却也无形中得罪了某些权贵高官。

任职兢兢业业、政绩有目共睹，康熙再让他兼任钱粮之事，负责稽查赃罚赎锾银谷细数。如果说此前的给事中职务，只是权重，如今介入钱粮之事，则是不折不扣的肥缺了。

“相传他在京师办公，负责钱粮的核查。每天送来的金钱，在府衙堆成了高高的小山。可他面对金钱诱惑，只是任由它堆放，分文不取，以致时间久了竟生出绿锈。他自己的生活却非常俭朴，以致有‘肥缺显瘦’的时评。”岳彩俭说。

砖瓦归乡，銮驾相伴

岳镇九生性刚直，为人落落寡合，在朝中不结党营私，也不阿附权贵。虽然获得了康熙信任，却也遭到了权贵嫉恨。更兼他负职刑名，兼管钱粮，不仅严于律己，对他人也等同待之，更受到同僚非议。

久而久之，岳镇九也觉得官场波云诡谲，自己性格难以久处。随着时间推移，他和主政大臣明珠的矛盾日深，难以调和。又因年岁渐高，精力不逮，便萌生了归隐林泉的退意。他奏请皇上，请求卸去官职，告老还乡。康熙见其心甚为坚决，便无奈同意。为表对他的敬重，特恩赐蟒袍一件，择日为他送行。

岳氏宗祠内的岳镇九像 （鲍青 摄）

岳镇九先后为官几十年，退隐时竟没有什么积蓄，穷酸落魄。他虽然笃信清廉自守可内心坦然，家人却觉得颜面有些挂不住。他们差人打造了一些箱笼，装上砖石瓦砾之物，来冒充金银细软。未成想，岳氏政敌闻风而动，立刻向朝廷上奏，告发他贪污纳贿。

康熙闻讯非常重视，派人将这些箱笼抬至大殿之上，亲自打开查验。看到一箱箱砖瓦倒出，众朝臣无不大跌眼镜。康熙也是愕然，便询问岳镇九为何如此这般。岳镇九据实上报：“伴驾多年，自认为官清廉，家中并无积蓄。家人嫌我寒酸，所以如此这般，皆为脸面而已。”

康熙深为感动，感叹岳镇九居膏腴之官，却能清廉自守，颇为难得。康熙不仅丰厚赏赐了岳镇九，还以半朝銮驾的高规格，护送他返乡安居。这半朝銮驾，包括旗、锣、牌、扇、金瓜、钺斧。銮驾的部分遗存，还保留在岳楼村宗祠里。

兴办义学，崇祀乡贤

返乡之后的岳镇九，不慕名利，恬淡自守，经常穿一身粗布衣，在乡村走动流连，与村民促膝畅谈、同居同耕，没有丝毫官员的架子。

在《岳氏家谱》中，便记载着他退休后的诸多趣事。某日无事，岳镇九便穿布衣，在村前散步观景。路上有农夫拉车上坡极为吃力，见有人在路旁，便顺手招呼上前帮忙。岳镇九二话没说，撸起衣服就帮着将车推过土岗。那人道谢后，便继续赶路。

这一切，都被田间忙碌的一位农人看在眼里。他跑出庄稼地，快步流星追上拉车人，质问道：“你知道刚才帮推车的人是谁吗？他可是在京城做过大官的岳老爷！”

拉车人听说后，心中骇然，立刻放下车，跑到岳镇九面前噗通跪下，口中忙道：“岳老爷，我不知是您老人家，不该有劳大驾。我该死！我该死！”

岳镇九将其扶起，便问是何人告知自己的身份。那推车人便指向身旁的农夫。岳镇九把农夫叫过来，问道：“是你告诉他我是岳镇九吗？”

那人喃喃道：“是的。他不该让您老人家为他推车。”岳镇九严肃地说：“既然你说我不该帮他推车，那你就帮他推车吧。你去帮他把车一直推到前方官道再回来吧。”其不喜身份等级之深，竟然至于此。

岳镇九在乡间乐于公益，众人皆知。他还兴办义学，崇祀乡贤，兴建家庙，续修家谱，以自己的影响力为乡野文化事业作贡献。

康熙五十九年，年逾九旬的岳镇九病故于家。正如同僚魏象枢所预言的：“先生之德业日进，其福、其寿，当与国运同新。”

岳镇九故去后，其品德和事迹在故乡流传，成为岳氏族人行事的楷模和准绳。至清末民初时，族人岳子良任地方官，清廉自守，颇有善政。待其卒后，九县乡亲募资刻碑，示纪念表哀思。石碑今存岳氏宗祠内。

如今，孟姑集镇依托本地文化资源，挖掘和弘扬岳镇九的廉洁精神。岳峰秀纪念馆和忠孝廉文化展览馆，已成为嘉祥县廉政文化教育示范基地。

·相关阅读·

俗语说“郡县治，天下安”。古时县令为“亲民之官”，对政权的意义不言自明。及至清朝，皇帝依旧多次强调基层官员清廉和干练的重要性。但究竟是清廉为先，还是干练为要，皇帝数次摇摆不定，以致难以解决贪腐渎职问题。

清廉与干练，摇摆不定的选择题

□ 本报记者 鲍 青

早在战国时，韩非子就强调基层官员的重要性，他说：“明主之吏，宰相必起于州部，猛将必发于卒伍。”到了清初，国家百废待兴，各地需要清廉精明的基层“亲民之官”，恢复生产，治民理政。

县令既是赋税的初步聚敛者，又是司法公平的初级践行者。他们劝农赈贫，兴养立教，维持政权的稳定。

为官之要，一为品德，一为才能。理想状态下，两者应合二为一。但在现实中，德才兼备之人毕竟有限，那么选官究竟以何为先？清代皇帝的选官标准，其实也发生多次变化。

乾隆七年（公元1742年），廷试进士有条制策云：“康熙年间有清官，雍正年间无清官，非无清官也，夫人而为清官也。”足见君主对吏治的重视。

清朝定鼎之后，沿袭了明朝制度，也承继了一些积弊，所谓“积弊难除，颓风犹煽，有司则贪婪成习”。直到顺治亲政后，吏治依旧败坏。皇帝曾忧心忡忡地说：“不肖者刻剥民财，营求升转，不顾地方荒残，民生穷苦。”顺治还担心，因为荐举不公的存在，导致自爱爱民者沉居下僚，以致操守改易。他多次颁布求贤诏书，选用清廉自守之人为县令，让残破的基层能够休养生息。

康熙亲政后，继承了顺治的用人政策，他“锐意整饬吏治，屡诏群臣荐举天下廉能官”。康熙极为看重清廉，屡次要求官吏“顺持身清正”。他在选用人才上，“以清廉为首”。考课上，“卓异之员宜以清廉为首列、若非洁己爱民，不得滥叨大典。应如所请，督抚开报卓异，先论守，次论才”。岳镇九在封丘任县令，清廉自守，卓有政绩。在其告老还乡之际，他亲赐蟒袍和半朝銮驾，便有激励廉吏之意。经过三四十年的努力，时风“广厉风节，群士慕效，吏治丕变。循吏被荐膺显要者，先后踵相接”。吏治已经较以前清明许多。

但到了康熙晚年，他越来越感觉到，许多县令为了博取时誉，不理政事，专务修身，以致地方事务趋于停滞，百姓不满情绪有所增加。他开始反思单纯提倡清廉的弊病。他评论江宁巡抚张伯行时，就改变了以前的观点：“操守虽清，为人糊涂，无办事之才。”当有人推举潮州知府张应诏能耐清贫，可任两淮运使时，康熙又认为：“一心为国即好官，或操守虽清，不能办事，亦何裨于国？”他还训斥那些清廉不作为的官员，将他们比作木偶泥人，是毫无用处的。帝王思想的转变，直接影响县令的选拔任用。康熙早期的廉吏，此时便不再多见了。

雍正即位前，即对吏治之弊有所认识，所以继位伊始，便发谕旨：“肤临御之初，简用人才，或品行端方，或操守清廉，或才具敏练，诸大臣密奏所知。”他要打破唯廉是举的陈规，意欲各择所长而用之。

雍正四年（公元1726年），他再发上谕对廉官进行剖析，认为：“操守者，不过居官之一节耳。安民察吏，兴利除弊，其道多端。倘但持其操守博取名誉，而悠悠忽忽于地方事务不能整饬经理。苟且塞责，姑息养奸，贻害甚至大过有才华的贪官。”

为了防止所选官吏贪赃枉法，雍正制定了各项规章，以监督和核查官员行政操守品行。但此时，因为帝王的猜忌和不信任，著名清官寥若晨星。以致到乾隆时，有“雍正年间无清官也，夫人而为清官也”的感叹。

乾隆即位后，继承雍正对州县官员选拔的方法。乾隆元年谕旨，强调上官对下官的监察，“州县有政令废弛，使诸恶复行于境内者，该督抚即行严参。督抚司道郡守，有不能率州县，殚心辅治者，必以溺职治罪。与通苞苴贿赂者等，决不轻贷”。以严刑峻法威慑基层官员，正是源于雍正的御官理念。

其实乾隆选用县官，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。如对康雍时期知县多取京官、科道官的做法，他认为利弊皆有。“从前行取人员内，大率拘谨守分之人多，而明通干济之才少”。即当时县官多半是安分守己之人，能明通时事，开创局面的并不多见。因此他在乾隆十六年，废除了实行许久的知县行取之制。

乾隆认为，官员只要“以人事君，公而忘私”，便可加以重用。为了德行和才能兼顾，他主张守令久任，熟悉地方事务。他鼓励基层知县，只要“心求端方，操守廉洁，扩充历练，不愧循良”。

因此在乾隆三十年以前，各地知县任满者众多。但到乾隆中叶后，他发现自己的良苦用心化为了泡影。他斥责朝臣督抚，对属下官员，尤其是地方县令，瞻徇回护，“致衰庸劣之徒滥等旷职”。此后各地县令频繁调任，久任者寥寥无几。

其实无论是提倡清廉，还是崇尚监察，都无法根除古代的吏治弊病。康熙倡导清操，官吏“虽未收公行贿赂，大抵多瞻徇情面”，不收财贿却极重人情，其实也是一种腐败。雍正尚“严明”，痛恨朋党，容不得群臣“瞻徇私面，稍有容隐”。群臣虽畏法，但“植党营私，坏法欺公”依旧层出不穷。乾隆“宽猛相济”，一张一弛，看似相得益彰，但最后却是“苟且塞责者”日益泛滥。到了乾隆晚年，贪官污吏与日俱增，大小官吏无不“贪黩无厌，征求财货，皇皇如不及”，吏治全面衰败。